

严复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 古今之变

□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在中国哲学史上,严复是一位站在中西古今哲学交汇点上的大哲学家,对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文,由此而登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哲学舞台,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思想性和影响力的大哲学家。他在文化观上所展开的西化思潮,在历史观上所力倡的进化史观,在政治哲学上所引入的自由主义,都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本体论问题上,他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实证主义原则,解构传统哲学本体论,建构新的科学宇宙论,走出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形态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困境,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展,成为中国哲学本体论古今之变的关节点,最为鲜明地显示出超越时贤的气度和划时代的性质。然而,由于人们习惯于从“西学”与“中学”关系的视域来看待和理解严复的思想,而不是着重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视域来看待和理解严复的哲学,因而所见者往往是他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与介绍,而遮蔽了他在“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的重要思想贡献。

当严复在本体论问题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时候,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形态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出现,当然也表现为“中学”与“西学”在那个时代特有的纠结,但实质上是“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转变为近代形态的产物,集中反映了“中国哲学本体论古今之变的内在矛盾”,而其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发生形态。尽管康有为、谭嗣同在建构具有近代特征的哲学本体论时,比以往任何中国哲学家都注意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思想资源,甚至开始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理论改造乃至替代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但他们毕竟未能脱离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哲学与科学相杂糅的思维定势,甚至把这一思维定势推向了极端,由此得出了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似

是而非的结论。这种状况,不仅没有能够实现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古今之变,反而导致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形态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困境。

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古今之变,开启于康有为、谭嗣同;而走出他们所导致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形态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困境,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开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哲学家则是严复。严复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从经验主义出发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解构,这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关注;另一方面,则是由之而来的对建构新的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启示,这往往不易为人们所看到。如贺麟认为:“他(指严复——引者注)把康德的不可知和佛学的不可思议等同起来,只满足于实证主义重经验归纳的感性知识,而拒绝从哲学方面来深入研究宇宙根本问题,确是受到他的学识和时代的局限。”在这一评价中,指出了严复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的思想局限,但却遮蔽了严复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影响。

严复从经验主义出发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解构,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主要由科学主义思潮加以继承和发挥。20世纪20年代,以胡适、丁文江、王星拱为代表的经验论科学主义,进一步以经验主义为基础,解构传统哲学本体论,建构新的科学宇宙论。他们从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哲学不同思潮出发,对经验做了各自不同的新理解,胡适强调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经验,丁文江、王星拱则强调马赫主义意义上的经验,但他们又都认同于经验对认识和知识的决定性意义,反对离开经验的范围去追求形而上的本体,从而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对传统哲学本体论作了比严复更坚决、更彻底的批判。胡适依据实用主义所讲的经验说:“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因此古来的哲学家可以随便乱说:这个人说是

‘道’，那个人说是‘理’，第三人说是‘气’，第四人说是‘无’，第五人说是‘上帝’，第六人说是‘太极’，第七人说是‘无极’。你和我都不能断定那一个说的是，那一个说的不是，只好由他们乱说罢了”。王星拱依据马赫主义所讲的经验说：“唯实派（即马赫派——引者注）说：心也不是实在的，物也不是实在的，只有感触——目所见的，耳所闻的，手所摸的——是实在的。”丁文江认为，西方哲学在进入20世纪后，已由探讨本体论转向探讨科学知识论。这些科学知识论，尽管分属不同哲学派别，具有各自理论特色，但都可以称之为“存疑的唯心论”，“因为他们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唯一的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觉官感触的外界，自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认为不知，应该存而不论，所以说是存疑”。这种“存疑的唯心论”正是玄学家的最大的敌人，“因为玄学家吃饭的家伙，就是存疑唯心论者所认为不可知的、存而不论的、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这样一来，自古以来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即使在本体论这块地盘上，玄学也混不下去了。他由此宣称：“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由于丁文江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激烈批判，引发了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

严复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解构，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也产生了启示作用。这种启示作用在于，在经历了严复和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解构之后，人文主义哲学家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需要重新确立出发点；这个新的出发点，不应再是康有为、谭嗣同所建构的具有近代特点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而应当是严复对这种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杂糅的思维特点所做的解构。20世纪30—40年代，人文主义思潮中相继产生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几个有代表性的哲学本体论体系，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这些新的哲学本体论，虽然各具个性特色，但它们也有共同之点，这就是都以区分科学与哲学为其前提，不再是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杂糅的混合物，因而有熊十力提出“科学”与“哲学”的划界，冯友兰主张“实际”与“真际”的区分，贺麟强调“心理意义的心”与“逻辑意义的心”的不同。冯友兰还就此把形而上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坏底形上学”，另一类是他所要建构的“真正底形上学”。他吸取了维也纳学派关于命题意义的理论，对“坏底形上学”提出批评说：“形上学中底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又都无可证实性，所以形上学中底命题，都是无意义底。从知识的观点看，形上学中底命题，都是如‘砚台是道

德’，‘桌子是爱情’之类，只是一堆好看好听底名词而已。其中底命题既是如此，所以形上学可以取消”。这与严复所说的“至于不可思议之物，则如云世间有圆形之方，有无生而死，有不质之力，一物同时能在两地诸语，方为‘不可思议’”，可以说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人文主义思潮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固然显示出不同于严复的哲学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受到了严复的启示。正是因为吸取了严复的启示，人文主义思潮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建，才避免了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导致新形态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困境，从而取得了划时代的重要成果。在这方面，不仅应当看到严复的思想局限，而且更应当看到严复的积极影响。

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科学主义思潮也出现了由拒斥形而上学向重建哲学本体论的转变，产生了金岳霖建构的“道论”体系。在金岳霖的哲学本体论中，保留了自严复以来科学主义思潮重视经验主义的传统。他在论证自己本体论的核心命题“道是式—能”时，就反复强调本体与经验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能”作为世界的质料，尽管不能用言说来表述，但却“可以在宽义的经验中（有推论有想象的经验）抓住它”；而“式”作为世界的形式，其间有基于经验的“能”不断出入，从而成就了“道”的现实开展。“它们的现实并不是由于纯粹的逻辑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所与或硬性和现实的核心，这是我们在经验中经常碰到的。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摆脱它们的。”但与此同时，金岳霖又对本体论与知识论采取了两分的态度，他认为：“我现在要表示我对于元学的态度与对于知识论的态度不同。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这种“元学的态度”与“知识论的态度”之不同，也就是哲学与科学之不同；在“元学的态度”中，强调的是主体的情感满足而不是科学的客观冷静。这也就是说，金岳霖在重建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同样以区分科学与哲学为其出发点，而不再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从哲学与科学相杂糅的思维定势出发，去建构与宇宙论相结合的本体论。

20世纪中国哲学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的探讨，尽管分属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但在这两大思潮的开展中都鲜明地显示出严复所具有的深刻影响。这也就清楚地表明，严复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探索与思考，以其超越时贤的气度和划时代的性质，成了中国哲学本体论古今之变的关节点。

■ 《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约18000字